

投资效率、消费率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湛 泳 蔡伟贤

摘 要: 本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在 GDP 中的变动以及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并进行国际比较,认为我国长期以来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致使我国投资率偏高的原因是投资本身特征与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相结合导致我国投资效率较低。因而从长期来看,要维持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转化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和提高我国的消费率。

关键词: 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投资效率;消费率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6)10-028-03

作者: 湛泳,湘潭大学商学院讲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天津,300071 蔡伟贤,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一 近年来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在 GDP 中变动及与世界各国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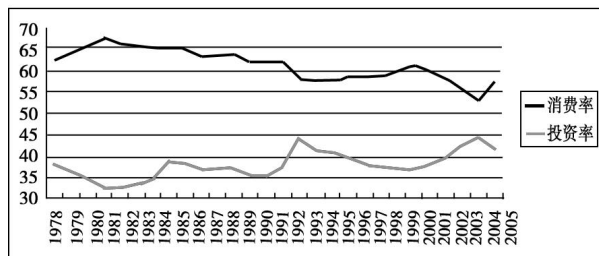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投资率一直保持在 40%左右,而且一度保持增长的势头,尤其是近两年来增长更是迅猛,1978年我国的投资率为 29.8%,2002年投资率上升到 39.4%,到 2004年又上升 4.8个百分点,达到了 44.2% (如表一所示),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消费率一直保持在 60%左右,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下降趋势,从 1978年的 62.1%下降到了 2002年的 58.0%,2004年又下降到了 53.0%。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从图一(1978~2005年在我国 GDP 中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这一变化趋势。

表一 (中国近年来数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投资率	37.3	43.5	41.3	40.8	39.3	38.0	37.4	37.1	36.4	38.0	39.4	42.8	44.2	41.2
消费率	61.7	58.5	57.4	57.5	58.5	58.2	58.7	60.2	61.1	59.8	58.0	55.4	53.0	57.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5 (注:2005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而得)

图一 1978~2005年我国 GDP 中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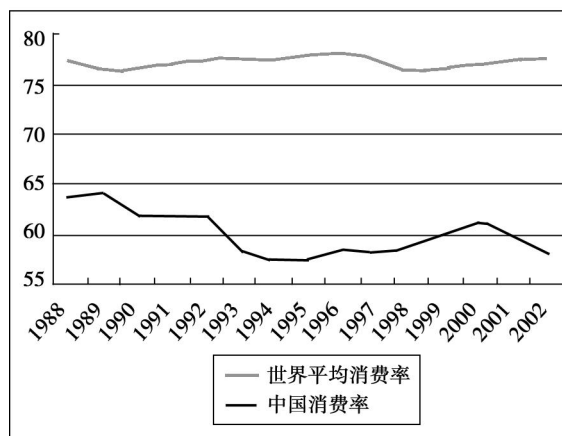


从图二(1987~2002年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消费率比较图)可以看出,1987~2002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保持在 75%以上,而且相对比较平稳,明显比我国消费率高出十多个百分点,且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从图三(1987~2002年我国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投资率比较图)可以看出,1987~2002年间,世界平均投资率一直保持在 23%左右,而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以来都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十多个百分点,而且这一差距也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都比较低,美国在 15.4%~18.5%之间,英国在 15.1%~19.3%之间,法国在 16.8%~22.5%之间,日本在 28.6%~32.3%之间;只有少数几个经济

转型国家的投资率相对较高,如新加坡在 32.8~37.9%之间,但还是低于我国。虽然一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高低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不能通过简单地对比某国与另一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来判断哪一国的更合理。但通过以上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还是能充分说明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以来都偏高,而消费率一直以来都是偏低的。

图二 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消费率比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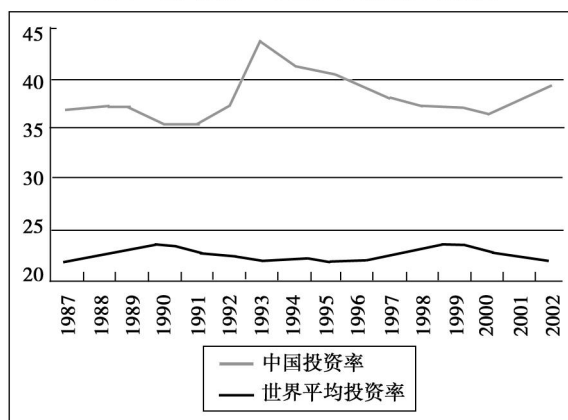


表二 (世界数据)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投资率	22.4	23	23.5	22.8	22.2	21.8	22.1	21.6	21.6	22.4	23.0	23.5	22.8	22.2	21.8
消费率	77.4	76.5	76.6	77.1	77.4	77.8	77.4	78.2	78.3	77.4	76.5	76.6	77.1	77.4	77.8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1、2004)

图三 我国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投资率比较图



二 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和我国投资效率

储蓄—投资机制就是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国民储蓄转化为一定规模、结构的投资的渠道、方式。它是实现资本和资源配置的手段、途径,因而决定着资源的配置效率。这里所讲的储蓄和投资是从大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的,具有广泛的含义。储蓄是指一国常驻机构单位(含居民)收入和支出账户上汇总所有现期收入和支出后平衡的余额,包括总储蓄和净储蓄。总储蓄包括固定资产消耗(折旧价值)、资本转移和净储蓄;净储蓄是指各机构部门扣除固定资产折旧之后的收入中未用于现期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全部剩余。储蓄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为了将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进行价值积累的过程。一般而言,从事经济活动交易的各利益主体都有可能成为储蓄主体,从而形成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含金融机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包括政府部门的资产折旧、转移收入中未用于现期支出的剩余等;企业储蓄包括企业资产折旧和一部分未分配利润及提取的各种基金等。居民储蓄包括:居民在银行的各种存款、购买的股票和债券、手持现金、合伙或独自开办企事业的投资、以各种形式参加的社会集资和企业内部集资、外币存款等。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了获得预期收益,预先垫付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经营某项事业的经济行为,这是一种资本积累行为。投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含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投资也分为总投资和净投资。总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在于形成未来的生产能力,以便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存货投资由三部分组成:生产准备过程中的原材料积累、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积累和企业持有的最后产成品的积累。净投资永远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

储蓄向投资转化有两大模式:直接转化形式和间接转化形式。直接转化即经济主体按其投资意愿进行自我储蓄、自我投资,实现封闭式的储蓄向投资的直接转化,储蓄者与投资者是同一经济主体。储蓄—投资机制的直接转化是以经济主体的

自我储蓄和自我投资为基础的。转化比较直接,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见效快,成本低,但直接转化受经济主体自我储蓄能力的约束。另外,由于储蓄和投资的非均衡性,经常会出现资源浪费现象。如果投资需求大于储蓄能力,则投资需求不可能得到正常满足,潜在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如果投资需求小于储蓄能力,则又会导致储蓄资源的闲置,进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正常转化。储蓄—投资的间接转化是指通过第三者(主要是金融机构)借助于某种特殊的信用工具而实现的储蓄—投资转化,其典型特征是信用活动(包括间接信用和直接信用)介入储蓄—投资转化过程。金融机构成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集中代表,把储蓄者的资金有效地动员起来,再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实现储蓄—投资的转化。在一般情况下,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者行为结构与投资者行为结构的吻合程度以及储蓄供给结构和投资需求结构的吻合程度。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的多样性,这两者又是不易吻合的。在没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是不高的,即使采用直接信用方式,由储蓄者和投资者在市场上直接见面也是如此。金融机构的介入,对于化解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矛盾,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储蓄向投资的间接转化,主要就是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媒介作用而完成的。从国际经验和历史发展趋势看,间接转化形式更具有优势,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储蓄—投资转换机制的变换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拨款制”,二是改革开放后以银行为中介,通过国家银行信贷计划为主导的“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储蓄—投资机制的主导形式是“财政预算拨款制”。国家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尽快实现工业化,实行了“藏富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政府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以税收和征收利润的方式,掌握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实行集中储蓄、集中投资。企业与居民的储蓄能力、储蓄水平极低,且不具备独立的投资主体地位。因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国家计划,以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实施的直接转化。在这种直接转化形式下,投资具有较强的实物性特征,计划委员会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为“藏富于民”,企业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逐年提高,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媒介信用的功能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当时金融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是以银行为中介,通过国家银行信贷计划而实现的。“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制”就成为这一时期的储蓄—投资机制的主导形式。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为储蓄向投资的多渠道转化提供了基础。随着市场化改革取向的逐步推进,计划手段在明显减弱,市场导向作用逐步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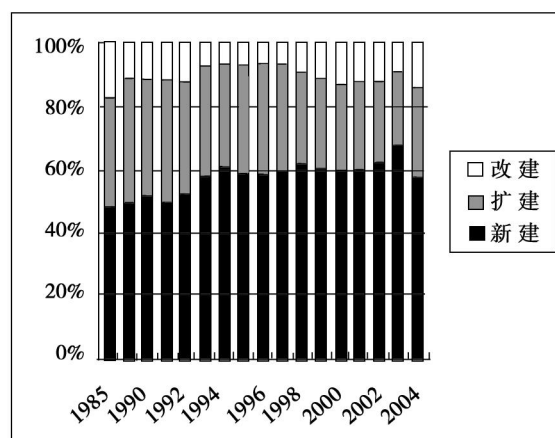
目前,我国社会资金从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是通过由金融体系中占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国家银行是居民

个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导金融中介。虽然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在我国 GDP 中消费率很低,投资率很高,因而储蓄率较高。但高储蓄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成本,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如果能高效率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储蓄的使用效率就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越高,社会资金运行状况就更为健康。按以上分析,在当前我国效率低下的储蓄—投资机制下,经济增长应表现乏力,但由于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数额巨大的货币发行收益和金融剩余,虽然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发挥关键性的支持作用,但经济改革起步阶段的巨额货币发行收益和非国有经济向国家提供的巨额金融剩余成为近些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源泉,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弥补了储蓄—投资机制的低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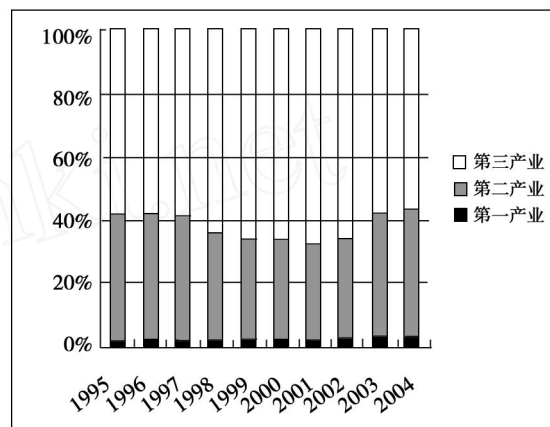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投资作为一种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需求效应;另一方面,投资作为增加供给的手段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这是一种长期效应。同时,投资又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与不可移动等特点。投资的过快增长与消费率低下必然导致过剩经济。从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关系看,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投资增长的最初动因,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从根本上制约着投资的增长,从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资本形成率。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分析结果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1995年为 14.6%,1996年为 9.1%,1997年为 31.8%,1998年为 33.8%,1999年为 80%,2000年为 79.6%,2001年为 83%。我国已基本进入需求约束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这应成为我们分析投资需求变动的重要约束条件。因为在过去短缺经济时代,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带动作用非常突出,而今在经济过剩条件下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对投资的制约日益显著。如果消费不旺,投资者的收益率预期不佳,则投资需求势必萎缩。因而为减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消费约束,应着力于提高和改善消费总量和结构,并通过对消费的引导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张。自改革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下降。这既有消费需求总量不足的问题,也有产品结构问题。因此,为扩大消费需求,在调整收入再分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同时,应注重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在农村,大力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如电力、通讯设施的建设,为工业品市场在农村的扩大创造条件。城镇居民已基本实现小康生活水平,为此,应通过消费信贷等方式促进住宅、轿车、通讯、教育等的消费,引导居民增加实物投资,促进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只有消费的增长,才能为投资增长提供不竭的根本动力,储蓄才能更多地转变为投资。

近些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而且以新建和扩建等外延型扩张为主,如图示四所示,外延型投资(新建和扩建)占总投资额的 80%以上,而且所占比例还有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内涵型投资(改建)只占不到 20%,而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这不利于提高我国的投资效率。另外,从我国目前的基本建设投资产业结构看(如图五所示),第二和第三产业占了投资的绝大部分,第一产业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而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第一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提高投资效率,必须优化投资结构。

图四 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质构成图



图五 我国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按产业构成图



三 结 论

(一)从长期看应提高我国的消费率,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或刺激经济增长,提高资本形成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我们能提高投资效率,则目前的投资率比较恰当。问题在于投资的低效率使得资本收益率太低,也就是投资没有促进消费,投资的方向与消费者的需求出现偏离。这样的投资不但造成资源浪费、投资效率低下和生产过剩,还会引起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对消费需求形成排挤效应,严重阻碍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展。所以,应该对目前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电解铝)、汽车以及纺织业等进行结构性调控,积极调整国债的使用结构和方向,将国债使用重点放在改善大多数城乡居民消费环境和有利于刺激居民扩大消费方面。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以金融市场为中介,以多种信用工具为载体的“市场融通制”作为我国储蓄—投资机制的主导形式。

完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即通过金融体系将储蓄从盈余部门转移向短缺部门,实现资本形成生产能力、收入的增长。高效率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加速一国资本形成,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宏观调控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基础条件。

(下转 18页)

面的投入不足。从产出角度来讲,湖南、河南的 s_1^+ 、 s_3^+ 不为零, s_2^+ 为零,说明两省新产品产值 (z_1) 和人均 GDP (z_3) 相对不足;湖北 s_1^+ 不为零, s_2^+ 、 s_3^+ 为零,说明其新产品产值 (z_1) 相对不足,这三省应注重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加强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与应用的产出;安徽省 s_1^+ 、 s_2^+ 、 s_3^+ 全为零,说明其经济转化能力相对较好。

第二阶段,DEA弱有效的是山西、江西两省。从投入角度看,两省 s_1^- 、 s_2^- 全为零,说明这两省经济转化投入较多;从产出角度来讲,两省 s_1^+ 、 s_2^+ 不为零, s_3^+ 为零,说明其新产品产值 (z_1) 和技术市场成交金额 (z_2) 相对不足,两省应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经济效益和加强技术市场建设力度。

四 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 DEA 方法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中部六省相对于我国京、沪、粤地区,区域创新绩效存在明显的差距。中部六省要进行有效创新,加大创新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研究也表明中部各省之间创新投入的方向和政策存在差异,需要调整,其目的是使投入产出结构更合理,资源利用率更高。针对本文的实证分析,中部地区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大区域创新投入,主要是经费的投入。从本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区域创新第一阶段(科技创新)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创新经费的缺乏。中部地区在创新人力资源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但经费的缺乏可能会使创新投入产出

结构不合理,创新绩效受到制约。

第二,做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衔接,避免出现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中部地区第二阶段的创新绩效明显不足,这反映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落后,要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关键是产业化。由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是一种经济活动,因此必须加强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目前中部地区不少重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以科研机构为主实施的,企业仅处于从属或配角地位。所以,必须树立企业在创新活动尤其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联系,完善科技产业化的环境,大力发展和培育中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有效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注:

任胜钢、吴金明:《中部崛起的区域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第1期。

Cooke P., Heidenreich M.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 [M]. UCL Press, 1996

盛昭瀚、朱乔、吴广谋:《DEA理论、方法与应用》,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林哲副教授参加本项课题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余小平)

(上接 30页)

(三)鼓励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技术进步已经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创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在于创新,因此政府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应强化市场经济的手段,着眼于技术创新。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往往追求眼前利益和以 GDP 为标准的政绩,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利用市场经济手段约束企业的短期行为。鼓励企业投资于国计民生工程应有政策上的一致性。政府投资要以大多数人福利的提高为出发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实际上就是投资的一种内涵型扩张,提高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的比例,是有效提高投资效率的途经。目前我国经济处于绝大多数产品生产过剩的状况,没有能够成为投资热点的短线产品,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多数产品在技术和品种上是落后的,缺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同时还有许多我们需要的产品自己不能制造。可以说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增加适销对路产品品种,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问题。鼓励并支持各行业,尤其是当前效益较好的行业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向国际水平发展,是使我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的重要途经,是促进我国经济升级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夏杰长:《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其财政政策选择》,《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 傅一书:《储蓄——投资机制转换问题研究》,《金融管理科学》,1995年第1期。

[3] 尹世杰:《关于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几个问题》,《财贸经济》,2001年第12期。

[4] 尹世杰:《论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及思路》,《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

[5] 马淑芳:《消费和社会投资的相互驱动》,《消费经济》,2004年第2期。

[6] 卢中原:《关于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的探讨》,《财贸经济》,2003年第4期。

[7] 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收入分配和总消费》,《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8] 包群、赖明勇等:《关于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4年第3期。

[9] 闻潜:《着力以消费启动经济运行——论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走向》,《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7期。

[10] 吴忠群:《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余小平)